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 与元诗风貌

The Literature Activities of the Multi-ethnic
Networks of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and
the Style of Poesy

刘嘉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 与元诗风貌

The Literature Activities of the Multi-ethnic
Networks of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and
the Style of Poesy

刘嘉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房宪鹏

责任校对:吕 飞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刘嘉伟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6096-2

I. ①元…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元代

②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I206.2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175 号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

YUANDAI DUOZU SHIRENQUAN DE WENXUE HUODONG YU YUANSHI FENGMAO

刘嘉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428 千字

ISBN 978-7-01-016096-2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一

曾 永 义

元代武功兴盛,幅员广大,但在文化基础薄弱的草原民族统治之下,一般都如郑师因百(璠)《从北曲四弊说到张养浩的〈云庄乐府〉》一文所说的,认为由于种族待遇的不公、帝王的昏虐、特权阶级的骄横、权臣猾吏的贪纵不法,而使百姓在一个世纪里笼罩于黑暗政治之下与畸形社会之中。当时的文士们,“乱世偷生,蹙蹙靡骋”,从而存在情性人格上流于颓废、萎靡、荒唐、纤佻的不良现象,这四种现象反映在当时的代表文学“曲”之上,也就成了“元曲四弊”。

郑振铎亦有《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和《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二文,都旨在说明元曲“公案剧”与“妓女剧”之内容与元代腐败的政治和丑陋的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其内容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可以用来证成郑师因百先生的看法。其实尚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再从“水浒剧”和“度脱剧”去分析探讨,同样也可以听到庶民百姓对现世愤懑悲怆的心声和看出士大夫对环境百般无奈的心情。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元代的文化自然衰落,其学术思想与传统文学也乏善可陈,后世学者更因此而认为有元一代的文化无甚研究价值。但是我有“人弃我取”的性格,认为被冷落的元代传统文学散文诗词,绝对有可取之处,于是在1974年以整年的时间从二百多部元人文集和文献中,辑录出五六十万言,分上下两册印行而成《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又据此写成五万余言的《元代的文论、诗论和曲论》;后来更指导台大中文所研究生萧丽华,以论文《元诗之社会性与艺术性研究》取得博士学位。

而今非常高兴地读到友人刘嘉伟教授即将出版的《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更能别开生面,发元代文化与诗歌之潜德幽光。惊艳之余,不禁也有一些感受。

嘉伟因为受到启功先生“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之讲演和萧启庆先生“多族士人圈”之观念的启示,认为从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来探讨元代诗歌的风貌成就,是元代文化沃野中很值得开发的论题。于是他先对元代多族文化圈纵横两剖面作鸟瞰式的概览,进而观照由其互动

中产生出来的元代诗歌新风貌,那就是:纪行诗的繁盛、叙事诗的开展,并由其尚武传统所激扬的诗格“豪迈洒脱”和其耿介气质所讲究的主张“崇尚尚质”。有此总体概念与认识,他接着分门别类,举出著名的代表性诗人,以点带面,由核心向外辐射,探讨其在多族文化圈中的交流互动对文坛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譬如元代文坛宗主虞集,他的凝聚力使非汉族士人向风趋雅。马祖常对多族士人的引导和荐拔,使得当世“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而非汉族诗人领袖萨都刺、迺贤,一为回回人,一为葛逻禄人,他们所倡导的“清和”诗风,涵醇茹雅,笔触工润,同样使汉儒熏陶浸染,成为一代风尚。其他如蒙古伯牙吾台部人泰不华之服膺儒学,唐兀人余阙之效法魏晋,蕲林人金哈刺之融会佛禅,也都是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诗豪。凡此嘉伟莫不透过博览约取、深思缜密之功夫,发人所未尝发,言人所未尝言。纵使其附录五篇,也都掷地有声,总体地呈现了元代文化文学的特殊面貌,是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学术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嘉伟于二〇一三年夏至翌年春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访学一年,参与我开设的“戏曲专题”课程,因得能与他切磋,而课余或饮于酒肆山坳,相顾莫逆。嘉伟又擅书法,尤添情趣。二〇一四年十月,余赴北京开会,转扬州大学讲演,嘉伟自徐州,杨红光、李彩霞伉俪自宁波,皆特意前来相会,令我感动至今。而现在又能拜读嘉伟的鸿篇巨著,恰如旭日东升,光照寰宇,更令我感到无比的喜悦。

2016年2月11日晨岁次丙申正月初四

曾永义序于台北森观寓所

序 二

查 洪 德

2014年暑期,在内蒙古通辽召开了元代文学学会的成立大会。在一次小组会后,一位老先生对我说:“今后的元代文学研究,要寄希望于你的这些学生了。”我当时特别感谢他对这些后进的鼓励,又说他是太过奖了。但在我心里,何尝不对他们的学术发展抱有希望呢?在那次会上,刘嘉伟和他的几位学友被选为学会理事,是理事中最年轻的部分,嘉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当然是我感到很欣慰的。2014年,我参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会议评审时有自我陈述,其中有人人才培养一项,我在陈述中说:“我指导的学生,毕业博士7人,出站博士后1人。这8人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3项;1人入选河南省青年社科专家;刘嘉伟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博提名。”在这个成绩单中,刘嘉伟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1项,还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我很感谢他们的努力。

2005年秋,我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工作,嘉伟是我在南开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他是吉林大学保送来的。在吉林大学读书时,就被评为全校“十佳大学生”。硕士毕业免试直接攻博。在南开读书期间,又被评为“南开十杰”,还获得“周恩来奖学金”等一系列荣誉。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博提名。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的年轻人。在南开,他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原本拟留校工作,但因多方面原因,他选择到江苏师范大学工作。后来我也尊重了他的选择。

嘉伟的硕士论文研究元代著名色目诗人迺贤,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扩展,题目就是《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嘉伟勤于思考,这个题目,他做好了。

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成就应该是很辉煌的。但从世纪初到80年代末,元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元曲研究。到9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元代的诗文文论等。但如何评价元诗,并没有形成新的思路和看法。进入21世纪,元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认识到,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时期,当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时期。这样一个独特时

期的文学,如何评价,如何认识,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新课题。用评价唐、宋和明代的眼光评价元代文学,用解读唐、宋和明代文学作品的思路解读元代作品,必有偏失。我们必须从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元代社会、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元代文人入手,重新审视元代文学。说它是一个大课题,原因在于,元代文学史的问题说不清,中国文学史后几百年的问题也都很难说清。比如说,研究界以往对元诗评价不高,就是因为人们用评价唐宋诗的标准评价元诗。元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诗歌对于文人的意义,都与以往不同。元诗当然也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元代文人已经不可能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依靠诗歌博取声名。在元代写诗,不需要歌时颂圣,也没有必要刻意炫才。不能靠诗歌致显达,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深晦其意。人们读元诗,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诗的蕴含,也没有以往诗歌那样费寻绎了。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但诗歌创作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代诗歌与以前诗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文人自身生活和群居社交生活的需要,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自乐吾之性情”(刘将孙《九皋诗集序》)成为诗歌创作重要的目的。但写诗品诗,已经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生活也更需要诗。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正因此,有人说元诗不反映现实问题。其实元代诗人并非不关注现实,但他们的反映现实,未必有“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那样直接的目的,而是目睹灾难之深重,人民之困苦,不能已于言,他们无暇修饰言辞,将自己所见惨象,直白道出:“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三般。犬衔枯骨筋犹在,鸦啄新尸血未干”,确实“铁人闻此也心酸”(张养浩《失题》)。这样的诗,虽不精致,但并不缺少动人的力量。我们必须换一种思路 and 眼光来评价元诗。

对于整个元代文学的研究,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思路的转换。元代的文坛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坛,其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倡于下、文与道一、雅俗分流、华夷一体。这些特点,使得元代文学大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文学。把握元代文学的特点和总体成就,也必须清楚元代文坛的这些特点。比如文倡于下,不了解这一特点,对元代文坛的很多现象都不能正确理解。此外,要把握元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在研究中还应该做到三个打通:打通不同文体、不同民族文学,打通上下时代文学,如此对一个时期文学做通观性研究,才不至于因眼观的局限而导致对文学史问题的主观解读,才能

使我们的看法比较客观。20世纪90年代关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还是优渥的争论,就是不同文体研究者各是其是造成的。而认识一个时代文学的特点,比如说风格特点,也应该以通观性眼光,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要认识元代诗歌的风格特点及其成因,就应该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可以看作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示例。

“多族士人圈”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提出来的。嘉伟的论文借用这一概念,对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做了具体考察,并揭示这种多族士人互动对元代诗风形成的影响,当然是开拓性的。经过这样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再看“中华文化是中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句话,就是那么实在,那么真实,那么有说服力,让人感觉是亲切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

嘉伟是我的学生,关于本书,我就不能多说,读者自有品评。我要说的是,嘉伟对文献的发掘,是深入的;对文献的掌握,是全面的;对问题的分析,是入微的。其学风,是扎实的。嘉伟是一个永求上进的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

当然,嘉伟还年轻,学术的路还很长。回到开头提到那位先生的期许,学术的希望在于年轻人。我希望我们这一辈人从事的研究,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展现出新的面貌。这是对嘉伟的期许,也是对他学友们的共同期许。

2015年岁尾

目 录

序 一	曾永义	1
序 二	查洪德	1
绪 论		1
第一章 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		12
第一节 非汉族士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12
一 疆域辽阔,多族共居		12
二 元廷对于汉文化的倡导		14
三 多种文化的交流认同		16
第二节 非汉族士人群体形成的历史进程		18
一 蒙元前期:重匠轻儒		20
二 元中后期:涵化日久,广泛汲取汉文化		25
第二章 元代多族士人圈概览		35
第一节 元代多族士人网络		35
一 姻戚		36
二 师生		39
第二节 多族士人圈的文化认同		42
一 从互动角度观照多族士人圈的汉文化认同		43
二 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		49
第三节 多族士人圈的发展历程与地域分布		55
一 多族士人圈的发展历程		56
二 多族士人圈的地域分布		62
第三章 多族士人圈的文化活动考述		76
第一节 刘仁本与异族友人的诗文酬唱		77

第二节	“诗书名将”述律杰与多族士人的文化互动	83
第三节	鲁国大长公主主持的超族群文艺雅集	89
第四节	多族士人参与的同题集咏举隅	94
一	咏芦花被	95
二	咏拂郎国献天马	100
第四章	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元代文化精神	109
第一节	多元并生的文化构成	109
一	蒙古文化之主导	109
二	西域文化之影响	114
三	汉文化的发展与宗教文化的多元	117
第二节	开阔正大的文化气象	122
一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122
二	开口论议,直视千古	126
第三节	贵真尚俗的文化特质	131
一	蒙元统治者之喜好倡导	131
二	散曲对于真情俗趣的大胆表现	133
三	杂剧、诗歌对于真情俗趣的大胆表现	137
第五章	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诗歌新貌	142
第一节	多族士人圈的互动对诗歌题材的影响	142
一	多族士人的贡献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142
二	多族士人的贡献与元代叙事诗的发展	153
第二节	多族士人圈的互动对元代诗风的影响	162
一	尚武的文化传统与豪放洒脱的诗歌风貌	163
二	耿介的精神气质与尚质崇古的文学观念	169
第六章	文坛宗主虞集的凝聚力与非汉族士人的向风趋雅	179
第一节	虞集与多族士人的文化活动	180
一	虞集对于“他者”的认同	180
二	更唱迭和 游宴雅集	184
三	题跋赠序 作记写铭	190
第二节	虞集的文学主张及对多族士子的提携、影响	194
一	虞集的思想底蕴与文学主张	194
二	虞集对多族士子的教化引导	198

三 虞集对多族士子的提携荐拔	204
第七章 主持风气的马祖常与多族士人群体的声势趣尚	210
第一节 马祖常的师承及同年交往	210
一 马祖常的师承	212
二 马祖常的同年交往	214
第二节 馆阁唱酬及诗风的相互影响	217
一 马祖常与馆阁诸公的唱酬	217
二 僚友切磋对诗风的相互影响	222
第三节 马祖常对于多族士子的荐拔及文风引导	226
一 马祖常尚质复古的审美取向及其成因	227
二 马祖常对多族士子的荐拔引导	230
第八章 萨都刺、迺贤之多族交游与元代清和诗风	234
第一节 萨都刺“遍接俊杰,获聆绪论”	234
一 萨都刺与座主、同年的交往	235
二 四处宦游,广交俊贤	239
第二节 迺贤“久留京师,出入于英俊之林”	241
一 初赴大都,“求天下硕儒为之师友”	242
二 再赴大都,“择天下善士为之交际”	244
第三节 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主导性诗风:清和	248
一 萨都刺、迺贤等少数民族诗人尚清的审美追求	249
二 汉儒中和之气的陶冶浸润	254
第九章 泰不华、余阙的人格感召力与元末诗坛	261
第一节 泰不华在南北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	261
一 泰不华在大多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	263
二 泰不华在江南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	267
第二节 余阙诗风的成因及传承	271
一 余阙诗歌风格特色	272
二 余阙诗风成因探析	274
三 余阙诗风的传承	278
第三节 泰、余二人的人格感召力与元末士大夫的政治认同	283
一 泰、余二人的人格感召力	283
二 元末士大夫的政治认同	288

第十章 金哈刺《南游寓兴诗集》与元代多元文学生态	291
第一节 金哈刺其人、其诗与性情襟抱	291
一 金哈刺的族籍、生平与其《南游寓兴诗集》	291
二 金哈刺的儒者情怀	298
三 金哈刺的解忧之道	304
第二节 从《南游寓兴诗集》窥探元代文学生态	309
一 艺术造诣的多样与文化构成的多元	309
二 诗作题材的多元与题画诗之新意	313
三 多元文化作用下的多样诗风	320
结 语 “三美一同”理念观照下的元代多民族文学活动	327
附录一 贯云石、薛昂夫等西域曲家的英雄情结	336
附录二 色目诗人萨都刺对李白的接受	345
附录三 《河朔访古记》的文史价值初探	351
附录四 《天下同文集》选词刍议	359
附录五 从《澹游集》看元末东南诗坛的构成	365
——兼论该集之文学史意义	
参考文献	372
后 记	379

绪 论

已故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于1983年6月4日,在乌鲁木齐作了题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的演讲,指出:“在唐朝以后,元朝这个民族的兼收并蓄气魄最大了”,“现在我们选元朝人的诗,讲元朝的汉文学史,你能把萨都刺、迺贤取消吗?讲宋元绘画史,你能把米芾、高克恭、倪瓒取消吗?讲书法史,你能把康里取消吗?不能,他们不但不能取消,而且还是起大作用、占重要位置的人。”^①

启老寥寥几语,指出了元代历史文化的特点:疆域辽阔、气势宏大,少数民族士人登上了中国文化史的舞台。他列举的诗人萨都刺是回回人^②,迺贤是葛逻禄人;画家高克恭是回回人;书法家康里巎巎及其兄康里回回是西域康里人(今属新疆)。^③在元代,少数民族士人大量崛起,融入中华文士队伍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因此可以说,我们要更清晰地认识元代文化、元代文学,就必须认识元代士人阶层、作家队伍构成的特殊性,探讨多族文人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文学活动,以及对文坛风气、作品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笔者遂以“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为题,进行研究考察。

第一节 研究范畴说明

中华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有众多部族交流互动,互补共生。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两次政治大分裂和民族大迁徙。隋、唐就是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唐贵族阶层不少人就有“胡人”血统。李唐王朝溃灭后,汉族向四周迁移;与此同时,北方各部族如沙陀、奚、契丹、渤海、女真等不断南迁,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在唐以前,中原王朝

① 启功著,赵仁珪、万光治、张廷银编:《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② 关于萨都刺的族属问题,争议较大,详见本书第八章。

③ 书法家康里巎巎名字的写法从《元史》卷一四三《巎巎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3页。也有学者认为其名应为康里巎巎,见张金梁《康里子山名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这里存而不论。

国力强盛,相对于周边政权,有着明显优势。而唐解体后,辽、金、西夏包括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国力较为雄厚,和宋政权形成了并存的格局。到了元代,蒙古一统海宇,第一次建立了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全国统一政权。

蒙元王朝立国较短。一般意义上的元代文学史都以蒙古灭金(1234年)为历史起点,以1368年顺帝北遁,朱明王朝建立为终点。而元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有“三分法”和“两分法”之说。^①本书中,大量出现了“元前期”“元中期”“元后期”的概念,如无特殊说明,则是采用了“三分法”中的常用观点:以1294年,忽必烈去世,为元前期的终结;以1333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即位,为后期的开端。

蒙元统治者西征南伐,建国之初,大量蒙古人、西域人内迁,加之之前辽金统治区的民族融合,元廷治下,民族众多,族群复杂。元朝实行族群等级制度,把全体国民分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据元明之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所载,蒙古人分“阿剌剌、扎剌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剌歹、晃忽摊、永吉列思、兀鲁兀、郭儿刺思、别刺歹”等七十二种。其中有重复、误入及漏列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指出其中十八种系相互重出。

元代色目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元廷为统治需要而设定的一个族群,用以协助蒙古统治,牵制汉族。^②“色目”一词,始见于《唐律疏议》,有“各色名目”之意。宋代科举将稀见姓氏,列为“色目”。元人使用该词,应是承宋而来,主要指“姓氏稀僻”的西域诸部。《南村辍耕录》中录有“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若里鲁、刺乞歹、赤乞歹、畏吾儿、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等三十一一种色目部族。在色目各族类名称中,有的是民族,有的是国家,还有的是宗教,甚为庞杂。

元代族群等级制中的“汉人”则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渤海等民族。较早为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以及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所谓“汉人”,是否等同于今天的“汉族”呢?我们得先看看“民族”这一概念。关于“民族”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国大陆一般使用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③。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

① 具体的研究情况可以参见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553页。

② 参见萧启庆《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0页。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通先生基于此进行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并撰文指出:“我们所用‘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有别于欧洲各国的传统,“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①这样看来,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在元代虽然和汉族人属于同一族群,但还不能和“汉族”等量齐观。在我们的论说中,契丹、女真人也以“非汉族”视之。^②“南人”的概念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并非单纯指南方汉人,而是包括原南宋治下的汉族以及南方、西南方的少数民族。

笔者题目中的“多族”,包括了蒙元帝国境内,四大族群中的各个民族,也涵盖了朝鲜、日本、天竺等地,居住在元帝国内,服膺中华文化,和各族士大夫有所交往的异国人士。有学者指出:“(族群等级制)对于‘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的传统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给予了沉重的冲击。诚然,这不是正确的政策、不是正确的思想,但毕竟打破了陈旧的思维定式,在客观上模糊了夷夏界限,缩小了夷夏隔阂。”^③元廷将管辖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看作是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并没有阻止族群间的学习交流、迁徙融合。多族士人间通过师生、座师、同僚、同年、姻亲、文友、同乡等为关系纽带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人际联系,他们更唱迭和、互赠序跋、刊刻文集、观书题画、郊游宴饮、贺寿赠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

大篆中的“士”字像个拉弓射箭的人,“士”最初指武士而非文人,《晏子春秋》中“二桃杀三士”的著名典故即为此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震荡、变革,知识阶层兴起壮大。“士”的概念也由“武士”转向了“文士”,近乎今人所说的知识分子。《论语》里“士”出现了多次,带有以道自任、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色彩。之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中,“士”的文化内涵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④总体说来,士人即有学问、重修养的儒者。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又常常儒道兼好,喜爱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在吟咏、“墨戏”中抒发情怀,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仕为高官者,当他们

① 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② 萧启庆先生指出:“契丹、女真之原有种族与汉族虽不同,但二者在元朝业已汉化并经官方划分为‘汉人’,在此视之为汉族,而不另列。因此,本文所谓‘多族’乃指蒙古、色目、汉族等三大族群而言。”见《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第6页。这与本书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

③ 伍雄武主编:《中华民族精神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④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公务之余,出离官员角色,以文士身份吟风弄月时,也就回归了士人身份。至于精通本民族文化,而对汉文化不甚了了者,不在我们论列的范围之内。

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①少数民族士人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是多方面的。经学、史学、文学、书画、医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蒙古、色目士人卓然成家,并且与汉族士人切磋学习、往还密切。限于笔者的时间精力与学科方向,本选题的研究以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为主。

根据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应由四个要素构成: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②本书所说的“文学活动”,基本上也就是从这几个维度展开,即在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所产生出来的文学作品,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关心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接受主体的文学阅读、文学批评、文学传播(尤其关心对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接受)。有学者指出:“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物,总是以不同的形态体现着、建构着一种文化精神。”^③所以我们也试图通过对于元代多族士人圈文学活动的研究,去探寻元代较为独特的文化精神。

元代文学雅俗分流,“今天人们说元代俗文学取代雅文学占据了文坛中心的位置,这只是今人的看法。真实的元代文坛,并非如此。当时的文坛,雅文学仍属强势,南北的诗文作家都属雅文学阵营。”^④而俗文学作家也并非编演杂剧的艺人,依旧以士人自居。元代曲家的生平与活动少见于文献记载,以至于多族文人间的关系我们难以考察,只能暂付阙如,而集中考察多族诗文作家之文学活动。

第二节 课题价值及意义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混一海宇、多族共居,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因

①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智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②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郅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③ 畅广元:《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④ 查洪德:《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又见《新华文摘》2010年第8期。